

生态保护区设立对周边村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谢涤湘¹, 简慧敏¹, 楚 晗^{2*}

(1.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州 510090; 2. 基尔大学地理系, 德国 基尔 24105)

摘 要:在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城市边缘地区村民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论文以广州小洲村为例,采用扎根理论研究了生态保护区设立对邻近村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在逐渐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使村民的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发生改变,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共同影响着村民的地方感。村民的地方感不仅受到地方变化影响,还受到其自身过往经历及人际关系产生的时空对比心理的影响。对比后产生的相对获得感更有利于积极地方感的构建,消极地方感则与对比后产生的相对失去感有关。时空对比机制的提出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村民不同地方感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好地培养和维护村民的积极地方感,进而更好地平衡生态区的保育和周边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地方感;生态保护区;扎根理论;小洲村

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不断加剧,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化。建立生态保护区是当今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之一^[1],但设立生态保护区带来的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必然影响到周边地区的发展和居民的生计生活。一方面,政府征地设立生态保护区不仅令村民失去土地,也转变了村民的生计方式;另一方面,村民世居环境因设立生态保护区而改变,这使得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区域也发生改变。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历经多年高强度开发,存在水质下降、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以及城市无序蔓延和生态环境保护用地冲突的问题^[2-3]。广州小洲村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在带来环境质量提升的同时也与地方原有社

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虽然村民依旧生活在原来的村落中,但村民的生活方式及对村落的情感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已发生变化。挖掘生态保护区设立对当地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更有效地协调生态保护和周边地区发展。

地方感主要表现为人与地方之间所产生的情感联系^[4]。20世纪70年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5]首次将“地方”概念引入人文地理学中,地方感逐渐成为“人—地”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学者对地方感的概念认知存在差异,段义孚^[6]认为地方感即地方自身的固有属性以及人们对地方的依附感,强调个体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归属感。Cresswell^[7]强调地方是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综合体,认为地

收稿日期:2023-05-15;修订日期:2023-08-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76);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20A1010020037);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GD20SQ16)。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07117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No. 2020A1010020037; Guangdong Planning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GD20SQ16.]

第一作者简介:谢涤湘(1974—),男,湖南攸县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城市与区域发展及规划。

E-mail: xiedixiang@gdut.edu.cn

*通信作者简介:楚晗(1994—),女,湖南岳阳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经济地理研究。

E-mail: chu@geographie.uni-kiel.de

引用格式:谢涤湘, 简慧敏, 楚晗. 生态保护区设立对周边村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12): 2401-2413. [Xie Dixiang, Jian Huimin, Chu Han.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on the sense of place of residents of surrounding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in Guang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12): 2401-2413.] DOI: 10.18306/dlkxjz.2023.12.010

方感是社会和文化实践中人们对特定地方的情感和意义经验。Shamai^[8]认为地方感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包含了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随着学者们对地方感研究的逐渐深入,地方感概念也越来越复杂与多维度。Massey^[9]提出了全球地方感的观点,强调地方和地方感的开放性和动态性。Relph^[10]探索了“无地方(placelessness)”和“非地方(non-place)”,拓展了地方感的研究范畴。在中国,朱竑等^[11]、谢涤湘等^[12]延续了段义孚的定义,强调地方感内涵中人们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李如铁等^[13]提出了“地方疏远”“地方厌恶”“地方恐惧”等消极地方感概念,拓展了地方感的内涵。楚晗等^[14]在Massey“全球地方感”的基础上提出内向型地方感和外向型地方感概念,并强调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调节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可见,地方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概念,具有包容性和动态性^[15]。由于本文的案例小洲村是被繁华都市包围的城中村,且是传统岭南文化村落,与棠下村、荔枝湾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文地方感参考李如铁等^[13]、楚晗等^[14]提出的概念,以动态性的视角综合考虑居民地方感的积极与消极、内向与外向方面。

国内外地方感研究的主要成果主要集中在地理学、旅游学领域,关注人与地方环境的情感关系与互动。在地理学领域,主要探究不同地方变化对居民地方感产生的影响以及居民地方感对地方发展产生的影响。如Li等^[16]探究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民地方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用地类型对村民地方感的影响不同;Krasny等^[17]发现牡蛎园丁对牡蛎和纽约河口的社会生态记忆与他们的地方感以及对当地的环境志愿服务动机存在紧密联系;孔翔等^[18]发现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过程导致的同质空间消解了区域的地方性,降低了居民对地方的认同和依恋,最终影响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旅游学领域则更多关注游客在旅行中对旅游地的情感体验和认同及其对旅游决策、旅游行为的影响,但也同时关注游客和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目的地资源保护态度等方面的影响。王泓砚等^[19]基于不同学科“场”的理论,提出旅游行为场和旅游氛围场的二维结构游客地方感理论模型;唐文跃^[20]对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资源保护态度进行研究,发现两者存在直接的显著正相关;包亚芳等^[21]探讨了目的地居民地方感对低碳旅游支持度的作用机制,发现环境态度在地方感与低碳旅游支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尽

管目前地方感的研究涉及主体多元,视角多样,但主要实证背景多为地方城市建设或旅游开发。相较于这两者,生态保护区强调对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往往禁止一般人员未经批准入内。这种强阻断周边村民与原有生产生活地方联系的外部事件所引起的地方感变化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

在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开发进程中,地方往往会经历人际关系疏离、原有生活瓦解、去地方化及环境破坏等问题^[22-23]。生态保护区担负着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对保护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加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探究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和村民地方感变化之间的互动能为研究地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解。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地方感”理论为基础,以广州小洲村民为研究对象,讨论生态保护区设立后,村民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村民地方感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以期更好地解析生态保护区与村民的互动,并对生态保护区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提供一定的思考。

1 案例地与数据来源

1.1 案例地概况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生态保护区——海珠湿地公园及其邻近村落——小洲村(图1)。海珠湿地公园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南部,由海珠湖、万亩果园及39条河涌构成,总面积约800 hm²,水域面积达380 hm²^[24]。小洲村位于海珠湿地公园第三期开发区周边,是有近750年历史的岭南水乡特色古村落,同时也是国家级生态村。海珠湿地公园作为全球特大城市中心区最大的国家湿地公园,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游客,园内经常举办生态体验、昆虫科普等夏令营和研学旅游活动^[25];小洲村独有的生态环境资源、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和悠久的历史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历史上,小洲村及周边村庄果园密布,果园的生态环境演化经历了良好阶段(1990年前)、恶化阶段(1990—2012年)和不断改善阶段(2012年至今)(图2)。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果园的生态环境功能开始得到重视,万亩果园被定位为广州“南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广州市政府划设了“广州市海珠区果树保护区”(简称“万亩果园”),颁布了《广州市海珠区果树保护区总体规划》。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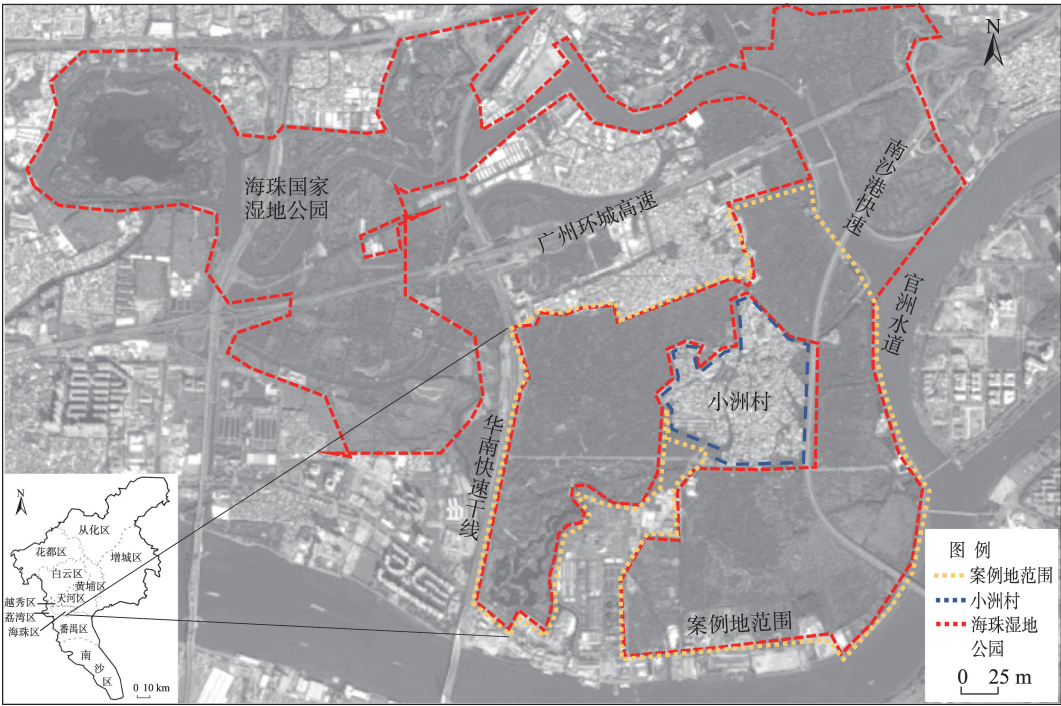


图1 案例地区位及研究范围示意图
Fig.1 Location and scope of the study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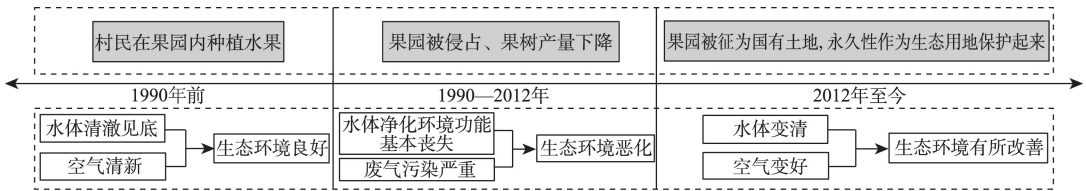


图2 生态保护区环境变化历程
Fig.2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

《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进一步提升“万亩果园”的地位,将其与白云山国家风景区、芳村花卉博览园共同定位为广州中心城区的“生态屏障”^[26]。然而,尽管其规划定位得到提升,果园环境的实际情况并未得到改善。“万亩果园”周边工业用地所排放的废气造成了当地空气污染的问题,酸雨频下。当时果园还缺乏专门的果林排水系统,这导致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进一步加剧。2012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实行“土地征而不转”的政策,将“万亩果园”的土地征收为国有,但不转变其农用地的性质,将其作为永久性生态用地保护起来^[27]。2015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万亩果园”的保护,广州市人民政府设立了生态保护区——海珠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促使小洲村等周边村落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明显改变,村民地方感也随之发生变化。

1.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资料收集等社会调查方法获取相关资料。在202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为期1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本文共深度访谈了20名受访者(表1)。我们所采取的抽样方法主要是理论抽样,即持续取样与理论建构同时进行,新数据的引入由理论中的空白、未回答的问题和未充分发展的观点所引导^[28]。其次本文还使用了滚雪球抽样法,针对本文案例地的特点及研究问题,所选取的受访者均为在小洲村居住时间不少于30年的村民,他们见证了生态保护区设立前后小洲村的发展演变,对其变化有深刻体会。样本中既有中老年人,也有青年人,保证样本的多样化,提高其代表性。最终一共访谈了2名村委工作人员、14名村民、4名海珠湿地公园工作人员。每段访谈时长均在30 min以上,转录文字材料达7万字。访谈

内容主要包括其在生态保护区设立前后生计方式、生活经历以及地方情感的变化等。

2 研究方法 with 过程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1967年由社会学家 Glaser 等^[29]最先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允许在没有先验性假设和结论的情况下开放性地收集与分析资料,是质性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

方法^[30]。区别于定量研究,质性方法注重对事物本质的微观探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主要通过提炼概念,归纳范畴,挖掘范畴之间的关联,不断建构与修正理论。有时扎根理论也会与结构方程模型、多重对应分析等定量方法相结合进行进一步分析或验证^[31-32]。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利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了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的关系^[15]、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33]等。参考这些研究,本文的分析路径包括:① 开放式编码:采用深度访谈,抽象化、概念化反映生态保护区设立对村民地方感影响的问题。② 主轴编码:不断比较概念,建立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使其具有指向性、逻辑性、理论性^[34]。③ 选择性编码:分析范畴之间关系后搭建核心模型。

2.1 开放式编码

对访谈文稿的原始文本逐句阅读和分析,经过两次编码和多次修正后,最终提取出438个代码,然后进一步缩编,形成了30个概念^①。开放性编码形成的概念实例如表2所示。

2.2 主轴编码

本阶段对开放性编码中相互独立的范畴进一步归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回到案例地现场,进行持续性地分析和比较,最终确定主轴编码^[28]。主轴编码结果显示,上一步所形成的范畴可归纳为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府政策、生活体验、社会关系和 地方感(图3)。访谈发现,设立生态保护区对村民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的影响最大。

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所发现的概念类属中选择核心类属概念,通过不断地分析,将与之相关的次要类属概念集中起来,以系统地说明和验证主要类属概念与次要类属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填充未来需

表1 小洲村访谈样本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 编号 | 性别 | 年龄/岁 | 身份/职业 |
|-----|----|------|-----------|
| K1 | 男 | 52 | 小洲村前任社长 |
| K2 | 女 | 32 | 小洲村村委工作人员 |
| G1 | 男 | 46 | 自由职业 |
| G2 | 男 | 58 | 自由职业 |
| G3 | 男 | 32 | 货运司机 |
| G4 | 男 | 38 | 专职司机 |
| G5 | 男 | 43 | 自由职业 |
| G6 | 女 | 43 | 家庭主妇 |
| G7 | 女 | 63 | 自由职业 |
| G8 | 女 | 34 | 小卖部老板 |
| G9 | 女 | 52 | 自由职业 |
| G10 | 男 | 51 | 保安 |
| G11 | 女 | 32 | 小学老师 |
| G12 | 女 | 68 | 退休工人 |
| G13 | 男 | 75 | 农民 |
| G14 | 男 | 65 | 农民 |
| W1 | 男 | 57 | 湿地工作人员 |
| W2 | 男 | 59 | 湿地工作人员 |
| W3 | 男 | 48 | 湿地保安 |
| W4 | 男 | 56 | 湿地工作人员 |

注:编号中K、G、W 分别代表村委工作人员、村民、海珠湿地公园工作人员。

表2 开放性编码形成的范畴示例
Tab.2 Example of a category formed by open coding

| 编号 | 原始语句 | 概念化 | 范畴提取 |
|-------|--|-------|------|
| H1 | 以前整个村都是搞生产的,这里是水果区,大家都是农民 | 务农 | 生计方式 |
| H5 | 这里最主要是种龙眼,黄皮和荔枝都有,但不是最主要的,产出最高的就是龙眼, 杨桃那些算比较少的 | 种水果 | |
| H10 | 男人是要扛起家里的重任的,要养一大家子,耕田是很累的,赚辛苦钱,可是不干 就没饭吃 | 养家糊口 | |
| | | | |

① 在编码前,随机预留4份访谈文稿作为理论饱和度验证材料。在所有编码结束后,对预留的4份访谈文稿进行编码,发现并无出现新的概念与范畴,则理论饱和度验证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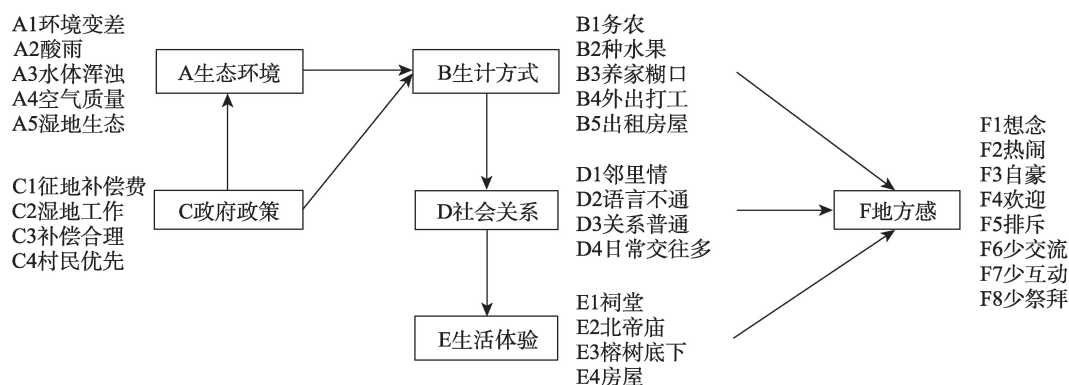


图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Fig.3 Axial coding and paradigms

要完善的类属概念的过程^[35]。分析主、副范畴后发现,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促使当地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交往空间以及生活空间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当地村民的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并进而影响村民的地方感(图4)。

3 结果分析

根据选择性编码的结果,发现尽管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使得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但随着原有果园土地征收为国有并作为永久性生态用地被保护后,村民被禁止入内,这使得村民对生态改善的感知不明显。“并没有太大的感知,反正都围起来了进不去,进不去感受不到的,我怎么知道他生态环境好不好呢”(G4);“(生态环境)应该是变好的,毕竟用围栏围起来不给进去了,没人进去了原始生态肯定会好点的”(G6);“不过现在进不去,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

的环境怎样,不过从围栏外看,应该是比下酸雨那段时间要好”(G13)。除了对生态环境的感知阻断外,果园的围隔还使得村民失去了部分的休闲空间,他们对湿地公园的建成与开放更加向往和期盼:“我也想湿地公园快点建好,这样我们周末也有新的去处,反正它征收一是保护,二就是搞个湿地公园惠民吧”(G2)。

因此,生态保护区外围的围隔使得生态空间的变化较少直接地影响当地村民地方感的变化,更多的是通过对村民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的改变而影响村民的地方感。

3.1 村民地方感变化主要原因

3.1.1 生计方式改变

1990年前,村民大多经营着果基鱼塘种植的农耕生活,主要以水果种植为生,如龙眼、黄皮和杨桃等,仅能解决温饱问题。村民夏季采摘水果,冬季进行土地养护,对土地的依赖性高,日常生产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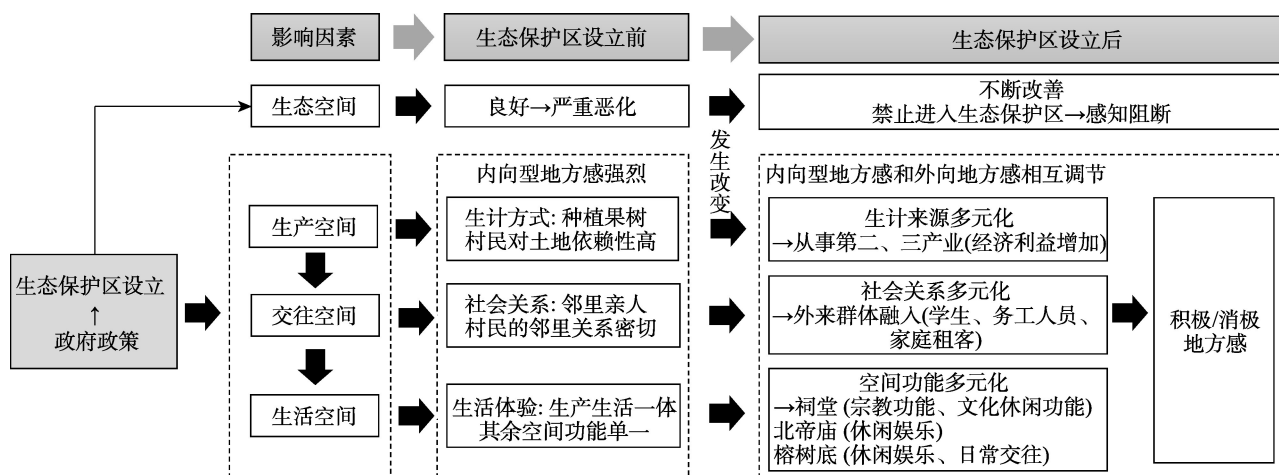


图4 村民地方感变化分析

Fig.4 Analysis on the change of village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基本围绕土地开展。“这里是水果区,以前都是靠卖龙眼维持生计,没啥钱”(G10)。1990—2012年,病虫害、空气污染等导致果树产量下降,村民的务农收入难以维持日常生活支出。另一方面,城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也助推了小洲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这使得部分村民转向旅游业和农业相结合的新型生计^[36],如利用果园开设烧烤场、农家乐。这给村民带来额外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导致出现果园内厨余垃圾堆积如山、水体进一步污染等情况。“2006年左右很多村民在果园内开设烧烤场增加收入,但环境状况却在直线下降,最直观的就是靠近路边的一些烧烤场会直接将垃圾堆放在人行道,污水也是直接倾倒在小涌里”(K1)。“螃蟹是很能反映环境的……后来只有很少的螃蟹,看不到水底,特别是开设烧烤场之后,弄得乌烟瘴气,垃圾随便扔,脏得很”(G10)。

2012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保护“万亩果园”的生态环境,将小洲村周边的果园都统征起来管理。为了顺利完成征地工作,首先,政府给予了村民可观的征地补偿费,有土地股权的村民大约能获得12万元/亩的征地补偿费。其次,政府还安排了10%的集体经济发展用地,每年给予村民一定的分红。最后,为了照顾村民的就业状况,政府优先安排村民进入湿地公园工作;村里也提供了女性就业指导,组织家政服务、育儿嫂等专业培训,帮助村民实现职业技能转换。此外,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村内租房需求激增,大部分村民利用征地补偿费重建房屋将其出租。房屋出租等第三产业的收入远高于务农,村民的收入有了显著提高。生态保护区设立完全改变了当地村民原有的生计方式,这使得人们构建了更加复杂的地方感。一方面,他们对耕作一辈子的土地存在不舍,但也不想过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日子;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从事第二、三产业心有期待,尽管部分村民因没有学历而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很想(土地),毕竟耕了一辈子,但也劳累了一辈子”(G13)。“没有学历也只能做司机这种比较‘低端’的工作,以前没学历还能在乡下耕地,现在地征了都没得耕”(G4)。近年来,随着研学旅游和古村旅游发展,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一定程度被解决,同时也推动了村落及其周边地区的城镇化^[37]。这不仅为村落经济发展带来正向影响,还强化了村民的开放型地方感。“很多游客来小洲村旅游,节假日一天的

营业额比平时一周的都多……欢迎他们(游客)来,肯定是小洲村好才来的……生活在这里我觉得既舒服又快乐,时间安排也比较自由”(G8)。“有游客就有生意,游客喜欢吃萝卜糕、酸萝卜、猪脚姜……我本身就很喜欢做这些岭南传统美食,现在退休了就干脆在自家楼下开个小店,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对这里肯定是满意的”(G12)。

3.1.2 社会关系改变

寻找和建立社会关系是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38]。村民自幼居住于此,生计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生产空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邻里关系良好、邻里沟通和谐,居民的地方感越强^[39]。小洲村原本是自给自足的封闭村落,主要的社会关系是亲人和邻里。20世纪90年代前,村民之间交往频繁,彼此维持着亲密的邻里关系,普遍拥有积极的内向型地方感。“以前都是隔壁邻舍一起去搞生产,晚上就坐在门口聊天,以前的关系真的好,印证了那句远亲不如近邻,我们都像亲人一样”(G9)。生态保护区设立后,征地补偿让村民有了改善居住条件的资本,加上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带来的租房需求,村内掀起了“建房风”。然而,村民在重建房屋过程中出现宅基地冲突、风水抢夺等矛盾,使得邻里关系恶化。“跟他们(邻居)关系不好的,之前建房他多挪过来10公分搞得很不愉快!”(G5)。“当时吵得很厉害,他的门口正对着我的门口开,这样不行的!不是他家不好就是我家不好!这就是风水”(G12)。

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还带来了新的邻里关系,主要包括租住人群与村民的租赁关系以及服务业从业人群与村民的交易关系。租住人群有学生、周边务工人员、家庭租客等,大部分学生和务工人员在小洲村或周边上课、工作,基本过着“公司/学校一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们与村民除了必要的日常交流,其他方面接触并不多,双方的关系局限于简单的房屋租赁关系;而家庭租客有更多机会与村民进行日常接触交流,如带小朋友一起玩、与老人家聊家常等。然而,由于语言隔阂、风俗差异,加上部分村民没有获得房屋租赁收益,也有村民认为外来人口的涌入“侵占”了村落,从而产生了消极的内向型地方感。“外地人多了,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想找个聊天的人都难了”(G7)。

除了租客,村里还存在大量服务业从业人群,包括餐馆工作人员、卖菜小贩、小卖部经营者等,他

们也是小洲村新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保护区设立后,由于土地被征收,村民没法自己种菜,只能依靠菜市场提供各类瓜果蔬菜。然而,大部分村民表示村内菜市场的经营权基本被外来人员垄断,价格要比周边市场更高。对于缺乏生计收入的老一辈村民,只能无奈“多花了冤枉钱”。“生活在村里成本也不低,菜市场里都是外地人卖菜,很贵”(G6)。此外,由于语言障碍,村民与服务业从业人员并未构建起情感交流,只有单纯的商业交易关系。因此村民对于外来人口垄断市场、抬高菜价的行为容易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买完菜就走,一点都不实惠,没什么好聊的”(G7)。可见,租赁关系和交易关系均打破了小洲村原本“熟人社会”的封闭边界,新的业缘关系对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产生了影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村民的乡土情怀,重构了村民地方感^[40]。

3.1.3 生活体验改变

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生产^[41],新的空间不仅带来新的社会关系,也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小洲村作为典型岭南水乡特色古村落的代表,村内有保存完好的宗祠、庙宇以及古榕树等,周边则是成片果园。20世纪90年代前,宗祠是维系村落宗族纽带的文化空间,庙宇是寄托村民信仰的神圣空间,古榕树及其周边广场是村民日常娱乐的休闲空间。生态保护区设立后,随着生计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多元化,祠堂、庙宇、古榕树及其周边广场的功能也更加多元化。当前,宗祠不仅保留着原有的祭祀议事功能,也新增了文化休闲功能,并逐渐发展成为村民日常情感交流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加强了村民的地方感。“端午节在宗祠拜太公...我们自己组织私伙局,周末就来这里(祠堂)唱粤曲,唱的人开心,听的人也开心……晚上会在祠堂门前练习舞狮,因为一些重大节日需要表演”(G9)。庙宇作为寄托信仰的神圣空间,是居民世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42]。小洲村民历来信奉掌管水的北帝,修建了北帝庙(玉虚宫)^[43]。村民在北帝诞举办一年一度的游行活动,祈求来年有好收成、村内能风调雨顺。生态保护区设立后,村民不再“看天吃饭”,祭拜北帝逐渐淡出村民的日常生活,北帝信仰逐渐减弱。如今,北帝庙成为游客休闲观光的主要场所,神圣空间原本具有的深刻地方性意义被不断消解^[44],其蕴含的乡土意义在现代化洪流中被冲淡,老一辈村民原有的地方感也在逐渐丧失。“以前会

拜的啊,初一、十五、北帝诞、过年那些大时大节都要去拜一拜,希望能有好的收成,家人健健康康的”(G2)。“以前拜北帝公,北帝公是看着我们村的神来的,不过现在不拜啦,去拜的都是那些老人了,我也只是小时候跟我妈妈去过,长大了就没去拜过了”(G7)。最后,生态保护区设立后,村民不再务农,日常闲暇时间增加,对休憩活动场所的需求也有所增强。古榕树及其周边广场不仅是村民日常社交、休闲的地方,也是承载记忆的怀旧空间。古榕树与村民的怀旧情感相连,唤醒了村民熟悉而又温暖的儿时记忆,进而加强了村民的地方感。“看到大榕树就会想起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在上面爬来爬去的场景”(G3)。村集体在榕树底修建了休憩桌椅,将最能体现小洲村水乡特色和情怀的地方与休闲空间结合,于是古榕树及其周边广场变成了更开放的公共空间。“征地后村内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坐在榕树底聊天、打麻将的老人多了……榕树底好啊,凉快!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G2)。

可以看到,一方面,生态保护区设立及因此带来的旅游业发展活化利用了各类村里的公共空间、提升其利用频率,为村民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旅游业的发展,村集体收益增加,通过对怀旧场所的修复、重建,优化活动空间,村民在公共空间集聚,进一步加强了积极地方感^[45]。总之,生态保护区设立推动了村落日常生活空间的变化,村民也享受了更多福利,如生活空间环境得到改善,休闲娱乐空间更丰富多元,历史文化氛围得以保留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与小洲村的积极情感联系。

3.2 地方感变化机制——地方变化与时空对比

上文探究了村落不同方面变化对地方感带来的影响。村落空间变化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演化过程,是内生力量和外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图5)。内生力量主要是村民为了改善生活体验,在租房经济中巩固生计资本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大多数房屋进行拆旧建新,从而推动了村落空间的重构。“失地后很多村民都重建了房屋并将其出租,很多青砖屋、红砖房被拆了,所以小洲村的变化还是挺大的”(G11)。外生动力主要是外来人口涌入和旅游业发展。一方面,外来人口涌入使得村内的房屋租赁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游客的到来也推动了村落风貌的重构。“当时的房子很好出租,只要有房就一定有人租,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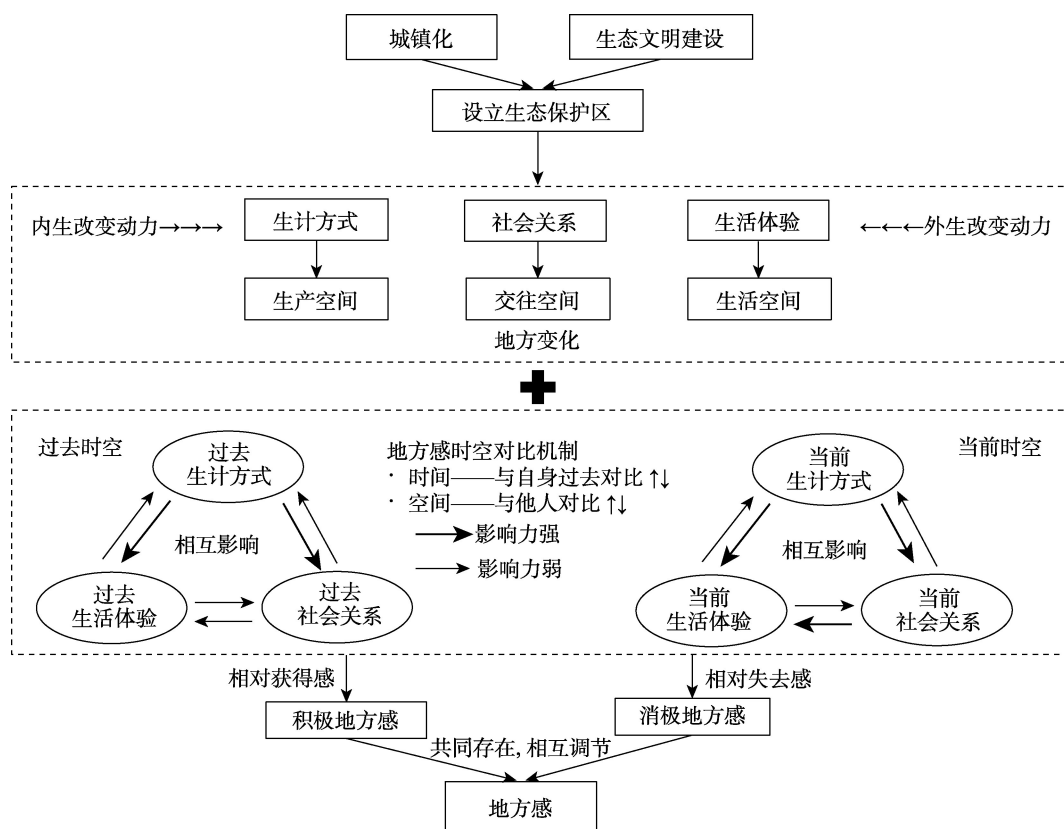


图5 地方感变化机制:地方变化与时空对比

Fig.5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changing sense of place: Place change and spatiotemporal comparisons

求很大,所以很多村民拆房重建,现在看到外墙相似的房屋基本都是在同一时期重建的”(K1)。“游客多了以后村里开了很多糖水铺、手工店、文艺店……有些店是由本地人经营的,但也有些是出租给外地人,由外地人来经营的”(G1)。可见,外生动力促使内生力量的出现,而内生力量进一步带动外生动力的发展,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带动村落空间的重构。

此外,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之间还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且这种相互影响不均衡地随时间改变而改变。以往村内的合作社模式要求村民每人每年均需上交固定产量的农作物,剩余部分归个人所有。这使得村民需要花大量时间耕作,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存在大量重叠,且多为集体行动。此时邻里关系较为和谐,村民之间会互帮互助,甚至有的会低价出售部分农作物帮助未完成生产目标的村民。当前,租房经济成为村民生计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租房经济饱和后,村民之间开始出现低价“抢租客”现象,恶性竞争导致邻里关系恶化。“出租房屋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以前很多画家、

学生来看房子,会主动‘拉客’,也会提供免费家具吸引一些短期租客”(G7)。外来人口的涌入促使村内出现更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租赁关系、交易关系等塑造了破碎的社会空间^[46],也会对村民的生活体验产生影响。不同村民们的生活体验存在较大差异。“外地人太多来,太嘈杂,不太喜欢”(G4)。“我觉得有外地人来挺好的,会很热闹”(G8)。

最后,研究发现,村民的情感变化不仅与地方变化相关,还与其自身过往经历及人际交往产生的对比心理相关。本文将此概括为地方感时空对比机制,村民往往会基于自身过往经历以及身边他人的经历而产生相对获得或相对失去感。相对获得感往往有助于产生积极地方感,而相对失去感往往导致消极地方感。从时间层面而言,大多数村民能比过往获得更可观的收入、更优美的居住环境,这种与自身过往经历相比会使其产生相对获得感;反之则会产生相对失去感。此外,相对获得和相对失去的感受因不同方面的对比而可能同时存在,从而彼此消解,例如村民会通过“置换/替代”的方式来平衡一些消极地方感的落差。如:“跟以前比完全不

一样了,历史韵味在逐渐消失,但生活变好了……教育水平提高了……”(G11)。空间层面的对比主要基于“我”的个人体验与他人进行的对比。个体的身体作为与情感、体验联系最紧密、最小的空间尺度,兼具生物和社会两重属性^[47]。过去,村民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较少出现明显的因与他人对比而产生情感变化的情况。但随着外来人口涌入,村民的收入来源多元化,经济差异逐渐变大,有租房经济收入村民的生活体验明显要优于没有租房经济收入的村民,村民之间的对比开始出现。此外,村民的社交圈也因此发生变化,能接受新人际关系的村民往往更易产生相对获得感,而对外来人群较为“排斥”的村民则更容易产生相对失去感。整体而言,在地方变化重塑村民地方感的过程中,村民自身经历带来的时空对比对最终的积极/消极地方感产生强烈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在快速城镇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城市生态保护区优化发展,保护周边村落的物质和生态空间,在满足村落、村民自身的发展需求的同时让村民留住“乡愁”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村民的地方感发生变化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现象,且与个体的时空对比机制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广州海珠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区周边村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生态保护区设立后,村民的地方感主要受到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等方面的影响,生计方式起主导作用,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②除了地方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村民的地方感还受到其基于自身过往经历及人际交往体验带来的时空对比机制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挖掘了生态保护区设立这一外界因素引起地方感变化的主要原因和其特殊性。由于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往往会干预居民对生态保护区的涉入,相对城乡建设或旅游开发,会更进一步地阻断居民对原有用地的感知。因此,有关部门应当更加关注用地围隔后对居民生产生活变化的影响并及时相应地做出安排。其次,以时空对比视角提出了地方感变化机制,强调个体自身过往经历及人际交往对地方感影响的重要意义。以往对当地居民地方感的研究

主要关注外在因素,忽视了个体根据自身独特经历与他人的对比构建的相对获得感与相对失去感。最后,积极地方感和消极地方感在个体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比的相对获得或相对失去中产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甚至相互消解性。然而,目前的研究较少关注这一点,因此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不但会改善生态环境,对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会影响到周边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村民的情感。为此,生态保护区设立发展过程中应高度关注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及日常生活体验的变化,相关部门多举办有利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各类活动,促进居民产生积极地方感,进而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Rodríguez-Rodríguez D, Martínez-Vega J. Protected area effectiveness against land development in Spain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15: 345-357.
- [2] 王金华, 黄华梅, 贾后磊, 等.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策略 [J]. *生态学报*, 2020, 40(23): 8430-8439. [Wang Jinhua, Huang Huamei, Jia Houlei, et al. Discussion on the strategies of coastal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0, 40(23): 8430-8439.]
- [3] 胡凯群, 林美霞, 吝涛, 等.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蔓延与生态保护冲突空间识别与量化评估: 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 [J]. *生态学报*, 2022, 42(2): 462-473. [Hu Kaiqun, Lin Meixia, Lin Tao, et al.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onflict space between urban sprawl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eco- gree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2, 42(2): 462-473.]
- [4] 杨婷, 周美岐, 林锦屏. 国内外地方感研究比较 [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20, 32(6): 48-58. [Yang Ting, Zhou Meiqi, Lin Jinping. Comparison of research on sense of place at home and abroad.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20, 32(6): 48-58.]
- [5]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M]. New York, US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6-8.
- [6] 段义孚, 志丞, 左一鸥.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6, 25(2): 1-7. [Tuan Y F, Zhi Cheng, Zuo

- Yi'ou. Humanistic geography: A personal view.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6, 25(2): 1-7.]
- [7] Cresswell T. *Place: An introduction* [M]. Hoboken, USA: John Wiley & Sons, 2014.
- [8] Shamai S. Sense of place: An empirical measurement [J]. *Geoforum*, 1991, 22(3): 347-358.
- [9] Massey D B.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146-173.
- [10]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UK: Pion, 1976.
- [11] 朱竑, 刘博.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43(1): 1-8. [Zhu Hong, Liu Bo. Concepts analysi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Sense of place,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1, 43(1): 1-8.]
- [12] 谢涤湘, 常江, 朱雪梅, 等. 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的地方感特征: 以广州荔枝湾涌为例 [J]. 热带地理, 2014, 34(4): 482-488. [Xie Dixiang, Chang Jiang, Zhu Xuemei, et al. Sense of place of the tourists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A case study of the Lizhiwan Stream, Guangzhou. *Tropical Geography*, 2014, 34(4): 482-488.]
- [13] 李如铁, 朱竑, 唐蕾. 城乡迁移背景下“消极”地方感研究: 以广州市棠下村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7, 32(3): 27-35. [Li Rutie, Zhu Hong, Tang Lei. The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sense of place i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ur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urban village Tangxia,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7, 32(3): 27-35.]
- [14] 楚晗, 谢涤湘, 常江. 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关系研究: 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9, 34(4): 54-62, 72. [Chu Han, Xie Dixiang, Chang Ji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Lizhiwan Historic District,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9, 34(4): 54-62, 72.]
- [15] 郑昌辉. 在城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地方感: 概念与研究进展综述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5): 116-124. [Zheng Changhui. Re-recognizing the sense of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progress.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27(5): 116-124.]
- [16] Li Y, Li Y R, Fang B, et al. Land use change and farmers' sense of place in typical catchment of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of China [J]. *Land*, 2021, 10(8): 810. doi: 10.3390/land10080810.
- [17] Krasny M E, Crestol S R, Tidball K G, et al. New York City's oyster gardeners: Memories and meanings as motivations for volunteer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32: 16-25.
- [18] 孔翔, 陈丹. 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影响研究: 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6, 31(4): 26-32. [Kong Xiang, Chen Dan. The influence of suburban development zones on de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of the host regions: A case of Changsha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Human Geography*, 2016, 31(4): 26-32.]
- [19] 王泓砚, 谢彦君, 王俊亮. 凝视性景观与互动性景观: 旅游场景类型对游客地方感的结构性影响 [J]. 旅游学刊, 2021, 36(11): 80-94. [Wang Hongyan, Xie Yanjun, Wang Junliang. Gazed landscape and interactive landscape: The structural impacts of landscape types in tourism field on tourists' senses of place.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1): 80-94.]
- [20] 唐文跃. 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1, 20(5): 574-578. [Tang Wen Yue. Influences of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o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resource protection: A case study of Jiuzhaigou, Sichua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1, 20(5): 574-578.]
- [21] 包亚芳, 孙治, 薛群慧, 等. 居民地方感对西湖世界遗产地低碳旅游支持度影响: 环境态度的中介作用 [J]. 旅游研究, 2015, 7(2): 13-20. [Bao Yafang, Sun Zhi, Xue Qunhui, et al. The influence of place attachment on residents' support for low-carbo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West Lake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 *Tourism Research*, 2015, 7(2): 13-20.]
- [22] 解芳芳, 朱喜钢, 孙洁.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地方感重塑研究: 以台中市中和社区为例 [J]. 上海城市规划, 2018(4): 50-55. [Xie Fangfang, Zhu Xigang, Sun Jie. Research on the re-establishing sense of place in rur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Zhonghe Community, Taichung City.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4): 50-55.]
- [23] 银松, 李瑞, 殷红梅.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居民地方性感知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贵州雷公山地区为例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3): 144-156. [Yin Song, Li Rui, Yin Hongmei.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ness perception of ethnic village resi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ake Leigong Mountain area in Guizhou as an example.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3, 32(3): 144-156.]

- [24] 唐虹, 冯永军, 刘金成, 等. 广州海珠湿地生态修复过程中的鸟类多样性研究 [J]. 野生动物学报, 2018, 39(1): 86-91. [Tang Hong, Feng Yongjun, Liu Jincheng, et al. Bird diversity during cit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t Haizhu Wetland, Guangzhou. Chinese Journal of Wildlife, 2018, 39(1): 86-91.]
- [25] 方远平, 张琦, 李军, 等. 参照群体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市海珠湿地公园的游客群组差异分析 [J]. 经济地理, 2020, 40(1): 204-213. [Fang Yuanping, Zhang Qi, Li Jun, et al.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ference group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visitors: Case study of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from multi-group analysis of youngs and adults.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 204-213.]
- [26] 广州海珠发布. 海珠湿地, 十年记 [EB/OL]. 2022-09-20 [2022-12-12]. https://mp.weixin.qq.com/s/5ngy4RG_TG5W2EPUKrYVew. [Guangzhou Haizhu News. Haizhu wetland: A decade in retrospect. 2022-09-20 [2022-12-12]. https://mp.weixin.qq.com/s/5ngy4RG_TG5W2EPUKrYVew.]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碧水绿地润花城: 广州市海珠区以“只征不转”方式建设保护万亩果园湿地的做法 [EB/OL]. 2012-12-17 [2022-12-12].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1810/t20181030_2266529.html.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reen Waters and Verdant Landscapes Enrich the Flower City: The practice of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in constructing and protecting ten thousand mu of orchard wetlands through the 'Only Levy, No Conversion' approach. 2012-12-17 [2022-12-12].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1810/t20181030_2266529.html.]
- [28] Fassinger R E. Paradigms, praxis, problems, and promise: Grounded theory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5, 52(2): 156-166.
- [29] 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M]. Chicago, USA: Aldine Aldine Pub. Co., 1967: 18-48.
- [30] 吕蕊, 石培基, 聂晓英, 等. 河西走廊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机理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分析 [J]. 地理科学, 2017, 37(5): 718-727. [Lv Rui, Shi Peiji, Nie Xiaoying, et al. The mechanism on clust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rks of the Hexi Corridor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5): 718-727.]
- [31] 王腾飞, 马仁锋. 宁波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11): 1567-1580. [Wang Tengfei, Ma Renfeng.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Ningbo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11): 1567-1580.]
- [32] 仇梦媛, 张捷, 杨加猛. 新健康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地多维康复景观构成要素与作用机制研究: 以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 927-943. [Qiu Mengyuan, Zhang Jie, Yang Jiameng. Components and mechanism of health impact of multi-sensory therapeutic landscape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new health geograph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Purple Mountain National Forest Park.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5): 927-943.]
- [33] 黄坤, 吴文恒, 杨毕红, 等.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 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J]. 热带地理, 2022, 42(5): 751-761. [Huang Kun, Wu Wenheng, Yang Bihong, et al. Change and mechanism of place identity of residents in enterpris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n community of Northwest First Printing And Dyeing Factory, Xi'an.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5): 751-761.]
- [34] 杨晴青, 高岩辉, 杨新军.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整合研究: 演化特征、路径与理论模型 [J]. 地理研究, 2023, 42(1): 209-227. [Yang Qingqing, Gao Yanhui, Yang Xinjun. Research on vulnerability-resilience integr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path and theoretical model.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1): 209-227.]
- [35]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 18(4): 58-63, 73. [Chen Xiangming. Grounded theory: Its train of thought and method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1999, 18(4): 58-63, 73.]
- [36] 贺爱琳, 杨新军, 陈佳, 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案例 [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74-181. [He Ailin, Yang Xinjun, Chen Jia, et a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s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northern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 174-181.]
- [37] 刘天翌, 刘沛林, 王良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 以萱洲古镇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33-145. [Liu Tianzhao, Liu Peilin, Wang Liangjian. Th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old tow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old town of Xuanzhou in Hu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33-145.]

- [38] Brown G, Hausner V H, Grodzińska-Jurczak M, et al. Cros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preferences in protected areas of Norway and Poland [J].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2015, 28: 89-104.
- [39] 刘晓菲, 王振波, 宋静, 等.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1): 2099-2107. [Liu Xiaofei, Wang Zhenbo, Song Jing, et 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of mixed residential areas in Shenzhe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1): 2099-2107.]
- [40] 王亚娟, 孔福星, 刘小鹏, 等. 中国生态移民村社会空间的生产分析: 以宁夏固原市典型生态移民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20, 40(11): 158-166. [Wang Yajuan, Kong Fuxing, Liu Xiaopeng, et al.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 in ecological migration village in China: Take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village in Guyuan, Ningxia as an example.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1): 158-166.]
- [41] 田毅鹏, 张金荣. 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7(2): 14-19. [Tian Yipeng, Zhang Jinrong. Marx's social space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7(2): 14-19.]
- [42] 黄秀波, 刘俊. 民间信仰空间建构与认同边界: 广东惠州巽寮湾案例 [J]. *人文地理*, 2014, 29(5): 49-55, 108. [Huang Xiubo, Liu Jun. The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boundaries of folk belief space: Taking 'Da Ma' and 'Xiao Ma' as comparative cases studies in Xunliao Bay, Hu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Human Geography*, 2014, 29(5): 49-55, 108.]
- [43] 方远平, 易颖, 毕斗斗. 传承与嬗变: 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J]. *地理研究*, 2018, 37(11): 2318-2330. [Fang Yuanping, Yi Ying, Bi Doudou. Inheritance and transmutation: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318-2330.]
- [44] 郭文. 神圣空间的地方性生产、居民认同分异与日常抵抗: 中国西南哈尼族箐口案例 [J]. *旅游学刊*, 2019, 34(6): 96-108. [Guo Wen. Placeness production of sacred space, resident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and daily resistance: A case study of Qingkou Village of Hani Nationality in Southwest China. *Tourism Tribune*, 2019, 34(6): 96-108.]
- [45] Legg S. Memory and nostalgia [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4, 11(1): 99-107.
- [46] 冯健, 吴芳芳, 周佩玲. 郊区大型居住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空间再生: 以北京回龙观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3): 367-377. [Feng Jian, Wu Fangfang, Zhou Peiling. Neighborhood relations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social space in large suburban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Huilongguan in Beij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3): 367-377.]
- [47] 陶伟, 王绍续, 朱竑. 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 [J]. *地理研究*, 2015, 34(6): 1173-1187. [Tao Wei, Wang Shaoxu, Zhu Hong. The body, the view of body, and the study of body in huma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6): 1173-1187.]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on the sense of place of residents of surrounding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in Guangzhou City

XIE Dixiang¹, JIAN Huimin¹, CHU Han^{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Kiel University, Kiel 24110, Germany)

Abstract: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currently in a deepening phase, and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find effective ways to coordin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areas. A crucial aspect is ensuring that village residents can make reasonable us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poetic dwelling" and a strong sense of place. The case of Xiaozhou Village in the Haizhu Wetland Park, Guangzhou City serves as an exemplary case and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other areas. This study used Grounded Theory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s on the sense of place among surrounding village resident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izhu Wetland Park has resulted in changes in the village residents' livelihoods, living experi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se changes interact and mutually influence each other, ultimately shaping the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tland park has improved not only the residents' economic conditions but also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which a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sense of place.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village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s influenced by their past experienc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response arising from the spatiotemporal comparison through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ve sense of gain generated by comparison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itive sense of place, while negative sense of pla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lative sense of loss derived from comparison. The proposed spatiotemporal comparison mechanism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senses of place among village residents and offers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sense of place. By balancing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rrounding areas, positive sense of place can be sustained and strengthened.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in China and the importance of balancing 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areas.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and the village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the study offers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how to approach this complex issu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an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a region. By considering the spatiotemporal comparison psychology and past experiences, a positive sense of place can be cultivated and maintained. Overall,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interplay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fering a useful guide for future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Keywords: sense of plac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Grounded Theory; Xiaozhou Village